

朝鮮問題
與甲午戰爭

陳偉芳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朝鮮問題 与甲午戰爭

——

朝鮮問題と甲午戦争

朝鮮問題与甲午战争

陈偉芳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朝鮮問題与甲午战争

陈偉芳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6 · 字數 122,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3,300 定價(七) 0.65 元

統一書號 11002·242

目 次

第一章 朝鮮問題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中、日、朝鮮的历史关系	1
第二节 近代朝鮮成为資本主义国家海盜掠夺与阴谋 斗争的焦点。各国政策的分析	12
第二章 国际資本主义打开朝鮮大門	25
第一节 日本武力胁迫朝鮮开放——江华条約	25
第二节 清政府对朝鮮政策的改变——“牵制政策” 的形成	32
第三节 朝美条約。朝鮮向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开放	43
第三章 “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	53
第一节 “壬午兵变”——济物浦条約	53
第二节 中、日在朝鮮的爭衡与“甲申政变”	63
第三节 李、伊談判——天津条約	77
第四章 波濤暗涌的十年間	85
第一节 喧傳“俄韓密約”与英国占据巨文島事件	85
第二节 日本、美国侵略朝鮮的新姿态	96
第三节 袁世凱执行的干涉政策	101
第四节 朝鮮战云密布	111
第五章 甲午战争与外交	116
第一节 从东学党起义到中日撤兵問題	116
第二节 战前的交涉——李鸿章的联俄政策。矛盾 中的英国調停	126
第三节 战争与外交——清廷和战两难。英俄外援 絕望。美国袒日促和	140

第四节	美日勾結操縱下的馬关和議·····	157
第五节	三国干涉还辽与烟台換約·····	172
簡短的結論	·····	180

第一章 朝鮮問題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中、日、朝鮮的历史关系

朝鮮和中国邻近,两国交往密切,而且历史悠久。自汉唐以后,两国人民之間的和平貿易交通,日漸頻繁。相互移民、通婚,历代不絕。朝鮮人在中国留学的很多,也有在中国作官的,中国的經学、文学和典章制度傳入朝鮮。中朝两国人民长期的經濟文化交流,結成了深厚友誼的紐帶。虽然,中国历代統治者,正象封建时代許多强盛王朝热衷于擴張战争一样,常常出兵侵入朝鮮,变朝鮮为中国的“藩属”。但是,还应当看到,中朝两国人民也常并肩作战,对付共同的敌人^①。历史事实表明,中朝两国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相共的。

在朝鮮半島上,过去一向是几国并立的局面。十世紀时,王建統一全国,国号高丽,史称王氏王朝。到了十四世紀末年,李成桂推翻王氏王朝,改国号为朝鮮,受明太祖册封,史称李氏王朝。清太祖侵明时,朝鮮曾与明朝共同出兵夹击,終于失败。有清一代,朝鮮成为清朝的“藩属”。

关于中国和朝鮮的“宗藩关系”,也象中国和其他近邻“藩属”的关系相似,本质上是一种压迫的統治关系。它是宗法封建分封制度在中国与周圍邻邦間相互关系的反映。朝

^① 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屢見不鮮,如在明代,李如松率大軍赴朝鮮,与朝鮮軍隊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軍。

朝鮮統治者向中国皇帝“称臣納貢”，奉正朔，受册封。中国皇帝視朝鮮为“藩属”，有維持受册封的王統地位的义务。^①“宗藩关系”通常是在軍事征服或威胁下建立起来，就不可能不带有不平等和压迫的性质。“属国”統治者向中国統治者表示“臣服”，尊中国为“上国”，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国虽然一般地不公开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但并不是完全不加干涉。并在对外作战时，往往要求“属国”出兵夹击，或直接向“属国”征发兵士人夫、舟車、粮餉。这种負担还是相当沉重的。这种“宗藩关系”对于“属国”來說是一种可恶的标志。

日本与朝鮮仅一海之隔，发生关系也很早。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多經由朝鮮傳入。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学生”却总是来攪扰他的启蒙“老师”的安宁，在日本与中国、朝鮮的关系史中，充滿了海盜劫掠和战争的記載，日本侵略者眼中，朝鮮是日本向大陆发展的一个跳板。海島上的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計要走到大陆上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鮮和李如松抗日援朝战争，是說明中、日、朝鮮历史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件。它証实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关系，和日本假道朝鮮进攻中国的侵略思想的历史渊源。

原来，在十六世紀末年，这时候日本还在群藩割据时代，丰臣秀吉統一全国，开始策划侵略朝鮮和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写道：“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計劃到建立一个东方王国，置于日本的統制之下。为了最后征服中国的目的，丰臣秀吉于一五九二年派兵远征朝鮮。”^① 资产阶级学者笔下的丰臣秀吉“丰富的想象力”，正是封建主进行掠夺战争

① Keno Akiyama: The History of Japan, P. 193.

的貪得无厭的欲望的反映。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前后两次派兵达数十万人，规模之大为当时海外远征所罕見^①。先鋒部队于四月登陆朝鮮，战事节节胜利，秀吉想假道朝鮮进攻中国的計劃，眼看有实现的可能。六月間，秀吉得意洋洋的写信給他的侄子，說天皇于一五九四年可进北京城，而日本貴族便可瓜分中国人的财产了^②。但是，事实却粉碎了秀吉的夸妄。朝鮮海軍在英勇善战的李舜臣的率領下，利用特制的战船——龟船，在朝鮮西南海岸連敗日本水軍，击毀日船七十余艘。同时，朝鮮国王向中国告急，明政府便立即派提督李如松率軍四万余人援救朝鮮。中朝两国軍队联合阻击日本侵略軍，展开激烈的战斗。这一場战争打了六年，直到一五九八年，日本軍队才从朝鮮撤退。

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最后阶段，充滿了血腥与殘暴。連資產階級作家布朗（A. J. Brown）也不得不承認这样的事实：日本軍队遭遇到北方的寒冷、飢餓和疾病，把一切恨怒都轉到朝鮮人民身上，于是瘋狂的屠杀，焚燒，劫掠，到处发生。在日本軍队撤退返国时，整个朝鮮几淪为廢墟！有些被摧毀的市鎮，永远沒有重建的希望；財富粮儲被掠空了，朝鮮人直到第二年收获季节，才能得到仅足生存的食物。

① 据 A. J. Brown: *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 一書中的記載，日本派兵侵朝鮮分兩期，第一次于一五九二年派出十三万人，第二次于一五九七年派出十六万余人。見該書第 112—113 頁。但据中国学者研究，第一次派出水陆軍約三十万人，第二次派兵約十四万人。明朝派兵援朝抗日，第一次有李如松，第二次有陈璘和邓子龙。后說較可信。參看周一良：中国与朝鮮的历史关系，載“新建設”第 3 卷，第 3 期。

② Robert P. Porter: *Japan, The Rise of a Modern Power*, P. 50.

“絕望象棺柩上的罩布一样，复盖着朝鮮人的心坎”，他們永远不会忘記这次日本人带来的苦痛^①。

丰臣秀吉是失败了，他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但是，在他死后，他的事迹和“理想”，却世代代成为日本軍国主义者的教科書。从秀吉身上可以找到日本“大陆政策”最早的历史渊源。

进入十九世紀以后，新的历史条件支配着中、日、朝鮮的关系。这时候西方資本主义的势力侵入东方，中、日、朝鮮都成为侵略的对象。中国和日本的大門首先被打破，和資本主义国家訂立不平等条約，而国内又爆发着人民起义，封建統治秩序发生动摇。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国統治者在勾結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人民起义以后，开始进行軍閥自强的“洋务运动”；而日本統治者則利用人民运动的情势，实现“明治維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道路，支配着中、日、朝鮮今后的关系。

在中国方面，“洋务运动”是軍閥自强的运动。企图在外国的支持下，建立軍事工业、学习西洋軍事技术，一方面借以維持封建統治秩序，一方面扩大各軍閥集团的势力。“洋务运动”完全是封建性的东西，它并没有发展資本主义的要求，洋务派也絕不愿意中国封建文物制度有任何改变。政治上也沒有絲毫革新。洋务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来办洋务，結果虽然采用了一些資本主义国家近代的生产方法，却在封建主义的控制和阻碍下而遭受失敗。洋务派所規定的“官督商办”制度以及限制民間資本設厂，阻碍着中国民

^① A. J. Brown: The History of Japan, P. 115.

族資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确实使湘系和淮系軍閥壮大起来了,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軍閥掌权的局面,特别是淮系軍閥头子卖国贼李鴻章成为支配清代政治和卖国外交的中心人物。但是,洋务派所高喊的自欺欺人的“富强”的口号,完全落空。中国依旧落后和衰弱。

在日本方面,自一八五三年美国一个海軍艦队在彼理(Perry)率領下开入日本江戶灣,胁迫日本幕府簽訂“神奈川条約”之后,一八五四年間,日本幕府即先后与美、英、俄、荷兰四国締結若干补充条約,开放对外通商。一八五八年,日本又与各国締結若干补充条約。这些不平等条約的簽訂,使日本出現了殖民地化的危机。广大日本农民和城市貧民掀起了反对欧洲人,反对德川幕府和外国簽訂不平等条約的运动。农民反封建剝削的起义此时也走到高潮。六十年代的日本形成了一个革命的局势。新兴的資產阶级、資產阶级化的貴族和破产了的下层武士也参加到运动中来,并竭力把人民运动引向反对德川幕府,拥护另一个封建势力——天皇来統一日本。一八六八年实现了所謂“明治維新”^①。

日本从开港到明治維新,随着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日本也开始了一个目标与中国相同的“西法模仿”时期,首先注意的仍是軍事国防方面,她請来荷兰的軍事教官,建立海軍学校,开办鑄鉄厂;当荷兰于一八五四年送日本第一艘汽船时,日本政府即拟按照西法自己建造船舶。明治維

① 关于日本“明治維新”的进程,參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教程”,第二十七章“日本的明治維新”(中譯本第二分册)。資產阶级学者,对于“明治維新”具体措施的論述,可參看 Robert P. Porter; Japan, The Rise of a Modern Power, PP. 106—110.

新以后不久，一八七三年实行征兵制度，請外国教官来訓練軍隊。日本开始准备着战争。但是，日本模仿西法并不象中国那样仅以軍事工业为中心，开港后的日本，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紡織工业和其他日用品工业迅速发展，邮电，铁路，輪船等交通事业也建立起来了。明治維新实行了若干资产阶级的改革，在经济上，部份地廢除了妨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关系和各种限制，例如，准許土地自由买卖，用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宣布职业和貿易自由，統一币制，取消各地区間存在的关卡等。这些改革使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的发展。在政治上，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幕府归政。其后是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三年，及一八七五年三次天皇重要的改革令，廢藩置县，取消了將軍、貴族、武士的封建特权。同时又采用西洋的政治制度，改組中央政府，并于一八七五年成立一个参議院。一八八九年頒布宪法。这些政治上的改革，其意义是日本已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

明治維新所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在农村，封建因素被大量的保存下来。农民除遭受封建剝削外，这时又加上资本主义的剝削。资产阶级虽然从此得到了一些政治经济地位，但是，天皇代替了幕府統治，那些代表軍閥、封建主势力的藩鎮諸侯(尤其是支持天皇倒幕的西南地区的大名)和武士在政治上仍然起重要作用。以天皇为首的統一政权是貴族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集团相结合的政权。这个政权为了滿足貴族和武士对外扩张，以及资本家向外找寻原料和市場的需要，一开始就朝着軍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积极准备向外侵略。日本从一个受

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國家，迅速地變成了十分蠻橫的遠東資本主義強盜。^①

日本對外侵略的目標自然是在地理上接近而又衰弱不振的中國和朝鮮，第一步是掠取台灣和朝鮮，進而侵入“滿洲”；第二步是併吞中國，進而獨霸東亞，這就是所謂“大陸政策”。日本“維新志士”的老前輩吉田松陰在獄中所著的“幽囚錄”中有云：“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宜開發內諸侯，乘間奪加摸察加澳都加，諭琉球朝貢，会同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宗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又其“獄是帖”中亦云：“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滿洲，併吞中國，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償于朝鮮、滿洲。”^②日本的“大陸政策”，可說自明治維新開始時即已確定，至于在什麼時候發動軍事侵略行動，就要看以後的時機。

從日本向外擴張的歷史發展觀察，北進奪取朝鮮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的中心環節，是日本侵略者所特別重視的。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如果日本首先向中國的中部和南部沿海發展，將碰到一個強大的英國勢力的反對。這是對日本侵略者不利的。英國早已攫取香港為軍港，並企圖把長江流域和華南變成它獨占的利益範圍，因而將竭力阻止日本南進。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決定把刀鋒指向北方——朝鮮和“滿洲”，這是距離日本最近，行動最便利，遭受阻力最小的地區。雖然在日本北進的道路上，也會受到俄國的敵視，

① 參看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教程”，中譯本第二分冊，第367—368頁。

② 上引均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第156頁。

但俄国当时在远东的势力薄弱，不可能积极干涉日本行动。因而，从国际形势中避难就易，这是日本决策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从战略地位考虑，朝鲜是联络日本到中国北部大陆的桥梁，而且它在日本海入口处形成一个鎖鑰陣地。因此，把朝鲜从中国手中夺出来，就成为日本侵略活动的中心。^①

日本的兴起，向中国提出了新的问题：日本是侵略中国的力量？还是中国的朋友？日本会不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侵略的联盟？还是和中国、朝鲜结成反侵略的联盟？当时清政府官僚和士大夫对日本情况知道的很少，他们不可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毕竟提出来了。一八七〇年，日本就派使来中国要求订约通商。当时有许多完全不了解国际形势的顽固派，还以为日本是中国藩属，一切应按旧章往来，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要求订立什么通商条约，极力加以反对。但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这班洋务派人物，则主张与日本结约。这一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实际主持清政府的外交，起了“以夷制夷”的念头，想联络日本，他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同治九年十二月）上奏中说：

“今彼（指日本）见泰西各国业与中国立约通商，该国亦已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该国向非中国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不如就其求

① 参看弗·鲍露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第三分册，第111—112页。

好之時，推誠相待，俯允立約，以示羈縻。……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聞該國自與西人定約，廣購機器兵船，仿制槍炮、鐵路，又派人往西國學習各色技業，其志固欲自強以御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①

另外有一封致總署函中，李鴻章也說：

“……將來情誼日密，耦俱無猜。設一旦西國有變，不致為彼族勾結，且可聯東方形勢。”^②

顯然的，李鴻章在與日本進行締約時，他心目中有兩個主要的觀念：第一是羈縻日本，使不侵犯中國外圍藩屬，特別要防止日本與西洋各國採取聯合行動；第二是聯絡日本形成一個東方防綫，增加向西洋各國討價還價的力量。這兩個觀念在李鴻章主持締結時，具體的列入“中日修好條規中”：^③

第一條：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

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第二條：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

按照國際法的解釋，中日“修好條規”並不形成中日同盟，因為第二條中“必須彼此相助”一語，純粹是道德的意

①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一，第53—54頁。

② 同上書，“譯署函稿”，卷一，第10—12頁。

③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82，第33—37頁。“中日條約”，第1—5頁。

义，中日双方都不負任何具体的义务。第一条的規定則較为具体，中日两国均負有互不侵犯的义务，这正是李鴻章所特別重視的。在他奏报訂約經過时，就認為第一条規定的意义是“隱为朝鮮等国，豫留地步”^①。以后日本与中国在臺灣、琉球、朝鮮引起糾紛时，他經常引用此一条規与日本使臣相辯难。但是，尽管洋务派官僚在做“联东方形势”的梦想，而日本侵略者却不会因为一紙“修好条規”把自己束縛起来。

日本試探着侵略朝鮮的途徑。早在明治維新那一年（一八六八年），日本就派遣对馬藩主往朝鮮，报知日本政治維新，并致“修好”之意。日本国書中有“大日本皇帝”和“皇上”“奉敕”等文字。在朝鮮政府眼中，这只有中国皇帝的詔書中可以使用。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給朝鮮文書向来自称大君，現在改称皇上，不但違反旧例，而且无异視朝鮮如藩屬，朝鮮政府因而拒絕接受。日本并不甘休，一八六九年年底，繼續派佐田素一郎及森山茂等赴朝鮮詰問拒絕接受維新报知書的理由，朝鮮官吏仍以違背旧例答之，佐田等归国后，极力主張用武力征服朝鮮。森山茂这时的言論，露骨地表达了日本軍国主义者利用借口侵略朝鮮并轉移国内政治斗争視綫的意图。他說：“方今維新告成，四方不得志者皆英气勃勃，蠢然思动，若移植之于半島（指朝鮮半島），既可避内乱，又可拓国利于海外，洵一举两得之策也。”他主張遣派五十万士族，渡海进攻朝鮮。^② 这是明治維新后“征韓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 82，第 31 頁。

② “玄洋社史”第 37—38 頁，譯文轉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清华大学出版），第 6 頁。

論”的发端。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日本再派花房义质和森山茂等率两艘軍艦往朝鮮,欲促成日朝“修好通商”。朝鮮官吏对日本早存疑惧,又見花房等服装皆学西洋,以为日本衰弱,受制于“夷狄”,出榜告示国人:“日本人与西洋人交,均屬禽兽,不可与之交际!犯此禁者,处以断头之刑!”^①花房此行毫无結果。

日本因朝鮮拒使,于一八七三年副島种臣及柳原前光以換約事(指“中日修好条規”)来中国时,向总署詢問:“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該国自主,中国向不过問?”总署答以:“中国对于朝鮮,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鮮自主,与中国无关。”^②狡猾的日本使臣默不置辯,他們回国后,即主張发动对朝鮮的战争。

从明治維新最初几年开始,侵略朝鮮問題就已經成为日本政府討論最激烈的中心問題,充分的表現了这个軍国主义国家的特質。日本政府分为两派:一派对于侵略朝鮮采取激进态度,叫嚷着馬上对朝鮮“兴师問罪”。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种臣等是这一派的中心人物。他們的主張获得急于向外擴張的貴族和武士的支持,在日本輿論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征韓論”。这派人物被称为“征韓派”或“武功派”。但是日本政府中的另一派,所謂“文治派”人物如岩仓具視、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却不贊成馬上向朝鮮发动战争。他們的理由,認为日本正在轉变时期,維新的基础未固,財政脆弱,不宜于发动战争。而且認为此时国际环境也不能忽視,虎視眈眈的俄国,很容易在日、朝战争中攫取漁

^① 林泰輔:“朝鮮通史”,第258頁。

^② “同治朝籌办夷务始末”,卷93,第27頁。